

扩大内需、人力资本积累与 FDI 结构性转变

王晶晶, 陈启斐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文章利用 26 个省市 2004—2010 年的面板数据, 分析了我国 FDI 结构性转变的原因。研究表明: (1) 地区的需求规模和服务业 FDI 呈正相关关系; 在东部地区, 需求规模对服务业 FDI 的作用最强。 (2) 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服务业 FDI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东部地区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中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抑制服务业 FDI 的流入。 (3)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迫使 FDI 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的重要原因; 这一关系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 (4) 随着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提高, 我国对服务业 FDI 的需求会下降; 政府的政策红利有助于地区吸收服务业 FDI。

关键词: 需求规模; 人力资本; 服务业 FDI; 制造业 FDI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13)09-0120-14

一、引言

在过去 20 年中, 外商直接投资 (FDI) 急速增长, 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全球 GDP 和贸易的增长速度 (Raff, 2001)。许多学者对 FDI 的高速增长进行了深入研究, 丰富了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Markusen, 1995; Caves, 1996; Raff, 2001)。近十年,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投资领域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早在十年前美国服务业 FDI 就占据整体 FDI 的 60%。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2004—2011 年, 服务业 FDI 占总体 FDI 的比重从 23% 上升至 50%。2011 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 1 160 亿美元, 其中制造业 FDI 和服务业 FDI 分别为 557 亿美元和 583 亿美元, 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外资总

收稿日期: 2013-06-24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应对外需减弱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研究” (09BJY07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自主创新能力增进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 (10zd&020);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思路、模式、途径与政策研究” (2010ZDAXM009)

作者简介: 王晶晶 (1987—), 女, 江苏扬州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陈启斐 (1986—), 男, 安徽马鞍山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量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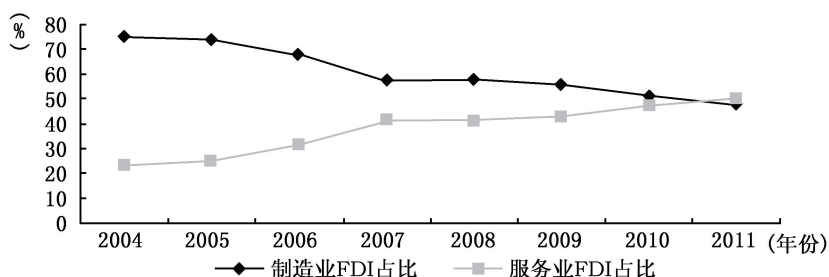


图 1 2004—2011 年制造业 FDI 和服务业 FDI 占外资总量的比重

但是学者对 FDI 的研究基本集中在 FDI 的溢出效应上, FDI 区位论研究对象主要是整体 FDI 或者制造业 FDI, 对于 FDI 结构性变动这一崭新课题, 至今还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分析 FDI 结构变迁背后动因, 不仅可以丰富服务业 FDI 占主导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还能帮助我国合理配置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 利用 FDI 的外溢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进而缩小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 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国内虽然有部分学者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但是分析框架与制造业 FDI 的基本相似, 忽略了服务业的行业特征; 部分学者尝试构建服务业 FDI 自身的研究框架, 不过他们没有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因此很难真正厘清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展现有研究: 第一,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服务业 FDI, 我们将服务业 FDI 从整体 FDI 中剥离出来, 并运用省级的面板数据进行细化研究。第二, 考虑到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地区的人力资本必然是吸引 FDI 的重要因素, 我们尝试分析人力资本对服务业 FDI 的影响。第三, 金融危机之后, 外需持续萎缩, 我国开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一战略会对服务业 FDI 产生何种影响, 地区的需求规模是否有助于吸收服务业 FDI? 这也是本文重点分析的内容。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 并进行归纳总结; 第三部分进行理论分析, 提出本文需要检验的理论假设; 第四部分介绍本文的计量模型, 交代数据来源; 第五部分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日趋服务化, 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了 FDI 服务化的特征, 因此早期对服务业 FDI 的研究以欧美学者为主。Jones 和 Kierzkowski(1988)提出了生产模块化和服务关联理论。随着生产的分散化,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

力,跨国公司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生产,这是 FDI 结构性变化的潜在动因。但是他们没有建立理论模型,也没有进行实证分析。Buch(2000)将样本划分为商业 FDI 和非商业 FDI,利用德国的数据对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重要指标。Nachum(2000)研究了美国金融业跨国公司的区域分布,发现信息传输效率和服务业集聚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这两位学者较早实证分析了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综合前面两位学者的研究,Raff 和 Ruhr(2001)认为服务品是知识密集型产品,这意味着消费者很难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对比分析,服务业存在很强的信息壁垒;由于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需求强度直接决定服务业的需求规模,服务业 FDI 会表现出追逐制造业 FDI 的特征;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受到更多的政府规制,因此政府规制也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重要因素。这两位学者从服务业的行业特征出发,较为全面细致地考量了影响服务业 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Kolstad 和 Villanger(2008)利用 1989—2000 年 57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证实了 Raff 和 Ruhr(2001)的观点,即制造业 FDI 和服务业 FDI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Redding 和 Venables(2004)认为地理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 FDI。Ramasamy(2010)利用 OECD 国家的数据发现,市场规模、劳动质量和制造业 FDI 都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 FDI 也逐渐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特征。但是关于中国服务业 FDI 大幅提高的原因,国内学者存在明显的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规模和政府规制能否影响服务业 FDI。曾国平(2007)利用多元统计方法研究了不同省市的引资环境,发现各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基础设施总量对服务业引资较为重要。张成和赵奇伟(2008)研究发现政府规制和基础设施是影响我国吸引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关键因素。杨仁发和刘纯彬(2012)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发现,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潜力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 FDI 的主要因素。另一类学者的研究结果却完全相反,王建华(2007)分析了影响我国服务业 FDI 的区位因子,发现市场开放度对服务业外资集聚效应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和劳动力成本与服务业 FDI 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唐保庆等(2011)利用 1985—2006 年美国对 24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验证了 Raff(2001)的观点,即服务业 FDI 具有明显的追逐制造业 FDI 的特征,工资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市场规模与政府规制对服务业 FDI 并没有明显的作用。

为什么学界对于我国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存在如此严重的分歧?我们认为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要从服务业本身的行业特征入手。由于服务业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Markusen, 1989; Raff 和 Ruhr, 2001; Francois, 2009),当一国拥有丰裕的人力资本时可以更好地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

跨国公司也会具有更强烈的投资冲动。现有的研究都忽略了该因素,因此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此外,新贸易理论表明,一国的需求规模是影响企业集聚的关键因素(Krugman, 1991; Davis 和 Weinstein, 1997、1999; Feenstra 等, 1998; Head 和 Ries, 2002; Hanson 和 Xiang, 2004)。而企业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性(劳动力蓄水池、投入产出关联和知识外溢)是吸引服务业 FDI 的重要因素,因此需求规模也会对 FDI 产生影响。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人力资本和需求规模对服务业 FDI 的作用。

三、理论假设

Dunning(1982)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之后,学者不断细化和补充该理论,到目前为止,对制造业 FDI 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基本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服务业 FDI 具有独特的性质,通常比制造业 FDI 面临更多限制(UNCTAD, 2004)。因此,对服务业 FDI 需要构建符合自身特征的理论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 1980、1985、1991)强调一国内需对于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在禀赋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一国拥有较大的需求规模时,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企业会选择在该国进行生产,因此需求较大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制造业 FDI(Markusen, 1989; Helpman 等, 2004)。本文认为,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不仅会吸引制造业 FDI,更重要的是对服务业 FDI 的吸收,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机制:机制一,需求规模会促进地区吸收生产性服务业 FDI。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生产的“碎片化”(Jones 和 Kierzkowski, 1980; Jones, 2000)和“服务关联”(service link)的提高。服务业中 73% 的产品进入下游制造业(Miroudot, 2009),这意味着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服务品将直接决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会促进制造业的集聚,这就会间接的提高对服务品尤其是生产性服务品的需求,进而吸引生产性服务业 FDI。机制二,需求规模也会提高地区消费性服务业 FDI。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生活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各个地区的消费性服务品也会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随着需求规模的提高,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品的需求也会上升。购买力增加会提高消费性服务品的差异性,导致消费性服务品本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与生产性服务品相比,消费性服务品更多地是要求提供者和消费者进行直接的接触,从而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双重的一致才能顺利完成交易。这会促使更多的消费性服务业 FDI 流入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需求规模是决定服务业 FDI 的重要因素。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会引发企业集聚,吸纳更多的服务业 FDI。

对于“劳动力成本是否会影响服务业 FDI 的流入”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数据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唐保庆

(2009)利用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数据发现服务业 FDI 对工资水平不敏感。唐保庆(2011)利用美国对 24 个 OECD 国家的投资数据研究表明,服务业 FDI 和工资水平正相关。制造业 FDI 有追逐低劳动力成本的特征(Lall 等, 2003),但是劳动力成本过低也意味着经济发展绩效差、生产力低下,而且一般也会伴随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实际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会抑制制造业 FDI 的流入,但是也会迫使企业进行研发、外包等,有助于地区分工和服务业发展。从而促进服务业 FDI 的流入。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资水平在缓慢上升,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工资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重要指标。工资水平上升,会促进分工的细化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吸引服务业 FDI 的流入。

全球化使跨国公司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早期的资源寻求更偏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下降,中期的效率寻求主要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 and 地区;随着世界经济服务化,低廉的成本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技术进步将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现阶段的创意寻求更多集中在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服务业兼具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特征,服务型企业对外投资时会优先考察一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丰裕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更快地接受国外先进的技术,并将其运用到生产中,而且也更容易进行模仿创新,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成功率。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人力资本是吸引服务业 FDI 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丰裕度越高的地区研发成本越低,生产性服务业 FDI 比例越多。

由于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较为匮乏。我国吸收 FDI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弥补自身资本的不足,通过外汇积累和吸收 FDI 来发展资本密集型行业。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人均资本存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两个典型事实表明,我国资本短缺时代已经过去:第一,我国的对外投资金额急剧扩张,从 2003 年 28.55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 746.55 亿美元,短短的 9 年时间飙升了 26 倍;第二,从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企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这是中国当前税制结构中实现内外税制统一的税种,也意味着 30 年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而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时代的终结。以上两点表明我国的资本丰裕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人均资本存量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我国对服务业 FDI 的依赖程度下降,从而抑制服务业 FDI 的流入。

现有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越低,越有利于服务业 FDI 的流入(唐保庆,2009;杨仁发和刘纯彬,2012)。但是本文认为,政府干预程度对服务业 FDI 实际上存在两种效应:一方面是对要素价格的干预扭曲了市场,不利于服

务业 FDI 的流入；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也是招商引资的主要发起者和政策制定者。由于中国官员“锦标赛”式的晋升机制，地方官员有招商引资提高 GDP 的激励。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政府行为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重要因素。政府行为分为消极的扭曲市场价格和积极的招商引资两种，二者的净效应较为模糊。

四、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在 Raff(2001)、Markusen 等(2005)以及 Ramasamy(2010)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本文样本数据的实际特点，在尽可能考虑遗漏变量和模型多重共线性的基础上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构建如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

$$\ln sfdi_{i,t} = \lambda_0 + \lambda_1 \ln sfdi_{i,t-1} + \lambda_2 \ln gdp_{i,t} + \lambda_3 \ln w_{i,t} + \lambda_4 \ln hum_{i,t} \\ + \lambda_5 \ln mfdi_{i,t-1} + \lambda_6 \ln pcapital_{i,t} + \lambda_7 gov_{i,t} + \delta_{i,t} + \epsilon_{i,t}$$

（二）指标的度量

$sfdi_{i,t}$ 和 $sfdi_{i,t-1}$ 分别表示地区 i 在 t 期和 $t-1$ 期的服务业 FDI。由于生产性服务品更多地是进入下游制造部门，对一国的最终产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内很多学者研究生产性服务业 FDI（唐保庆，2009，2011；杨仁发、刘纯彬，2012）。但是本文认为不应该片面地研究生产性服务业 FDI，非生产性服务业 FDI 进入非生产性服务部门，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种类，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的服务业 FDI。本文利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表示服务业 FDI，并根据实际汇率调整为人民币计价。

$gdp_{i,t}$ 表示地区 i 在 t 期的需求规模。实际上，需求规模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净出口等，为了全面衡量地区的需求规模，本文采用地区的总体 GDP 来衡量该指标，同时利用以 2004 年为基期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修正。

$w_{i,t}$ 表示地区 i 的劳动力成本。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表明，区域的劳动禀赋优势是吸引 FDI 的主要指标。参考国内现有的指标选取，本文用地区的平均工资来表示劳动力成本，为了剔除价格波动，同样以 2004 年为基期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修正。

$hum_{i,t}$ 表示地区 i 的人力资本存量。关于人力资本，本文主要参考陈钊（2004）和盛斌（2011）的做法，用区域受教育水平占劳动力数量的比重来表示。 $L_{i,t}$ 表示地区 i 在 t 年的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用 h 表示， $hum_{i,t} = \frac{6 \times h_1 + 9 \times h_2 + 12 \times h_3 + 16 \times h_4}{L_{i,t}}$ ，其中 h_1 表示当年小学毕业生人数， h_2 表示当年初中毕业生人数， h_3 表示当年高中毕业生人数， h_4 表示当年大专、本科

及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人数,6、9、12 和 16 分别代表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教育年限。

$pcapital_{i,t}$ 表示地区 i 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本文用资本存量除以区域的就业人数来计算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其中,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衡量,测算公式为 $K_t = I_t / P_t + (1 - \delta) K_{t-1}$, 其中 K_t 为当年的资本存量, K_{t-1} 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 I_t 为当期的投资额, P_t 为当期的资本价格, δ 为资本折旧率。样本期初数值,借鉴张军(2004)的测算数据;折旧率的选取较为多样,本文采用盛斌(2011)的做法,设定 $\delta = 9.6\%$ 。由于重庆建直辖市较晚,张军(2004)的计算中没有包含重庆市,本文采用陈纪平(2012)对重庆市资本存量的计算数据。

$mfdi_{i,t-1}$ 表示地区 i 在 $t-1$ 期的制造业 FDI。本文采用地区制造业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并根据汇率调整为人民币计价。 $pgdp_{i,t}$ 表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用人均 GDP 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gov_{i,t}$ 是地区 i 在 t 年政府实际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delta_{i,t}$ 是地区不可观测的其他影响因素, $\epsilon_{i,t}$ 是随机误差项。

(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海南、宁夏和新疆共 26 个省、市、自治区 2004—2010 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各省市年度统计年鉴、中经网和国研网。

为了更好地了解样本信息,首先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表 1 给出了样本的基本信息。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sfdi	182	10.9929	1.9003	5.2832	14.6879
lnmfdi	182	11.4922	1.8330	2.4849	14.5031
lngdp	182	8.8845	0.9154	6.1444	10.7367
lnpcapital	182	9.9042	0.6419	8.2914	11.6998
lnw	182	10.0843	0.3816	9.3805	11.1827
lnhum	182	-0.4582	0.2108	-1.0272	-0.0018
lngov	182	-4.4235	4.1029	-11.5496	-0.8345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整体层面

首先,我们从整体样本层面考察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由于动态面板

数据容易受到自身滞后项的影响,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失效,针对面板数据的特征,本文采用系统 GMM。该方法同时对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将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将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该方法可以利用更多的信息,不仅提高了估计效率,而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估计结果的准确率要高于 OLS。因此,本文以两步系统 GMM 计量结果作为实证结论,结果见表 2。

表 2 服务业 FDI 影响因素分析

	方程 1 lnsfdi	方程 2 lnsfdi	方程 3 lnsfdi	方程 4 lnsfdi	方程 5 lnsfdi
L. lnsfdi	0.401*** (0.0177)	0.385*** (0.0177)	0.424*** (0.0259)	0.151*** (0.0219)	0.229*** (0.0321)
lnmfdi	0.304*** (0.00651)	0.313*** (0.0112)	0.345*** (0.0119)	-0.0687** (0.0329)	0.0608** (0.0256)
lnpcapital	0.548*** (0.0559)	0.543*** (0.0804)	-0.827*** (0.221)	0.563*** (0.0814)	-0.492*** (0.189)
lngov	0.00948*** (0.00306)	0.0176*** (0.00519)	0.00425 (0.00278)	0.0320*** (0.00619)	0.0269*** (0.00478)
lnhum		0.856*** (0.184)			0.114 (0.286)
lnw			1.921*** (0.255)		1.454*** (0.264)
lngdp				0.959*** (0.0481)	0.726*** (0.0402)
Constant	-2.137*** (0.449)	-2.406*** (0.771)	-8.716*** (0.785)	-3.814*** (0.685)	-8.379*** (1.191)
Wald 检验	9492.34 [0.000]	4828.79 [0.000]	2655.71 [0.000]	9189.8 [0.000]	12650.56 [0.000]
AR(1)	-2.0885 (0.0368)	-2.0593 (0.0395)	-2.1409 (0.0323)	-1.8654 (0.0621)	-1.9497 (0.0512)
AR(2)	-0.7819 (0.4343)	-0.7561 (0.4486)	-0.7631 (0.4454)	-0.9665 (0.3338)	0.894 (0.3713)
检验	20.883 (0.528)	19.3104 (0.6261)	25.0329 (0.2955)	22.277 (0.4435)	19.4704 (0.6161)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82	182	182	182	182
截面数	26	26	26	26	26

注:实证结果由 Stata11 计算并整理得出,Wald 检验的原假设为变量是外生的,方括号内是 Wald 检验的 P 值。圆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表 3 同。

表 2 中 5 个方程均通过 Wald 检验,说明整体拟合效果良好,本文的回归

结果是稳健的。方程 1 是基准计量方程,方程 2—方程 4 是分别加入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以及需求规模的计量结果,方程 5 综合前面方程得出本文的最终计量结果。方程 5 的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支持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同时,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我们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假设(p 值均显著大于 0.1)。这意味着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1)需求规模与服务业 FDI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当需求增加 1% 时,服务业 FDI 会增加 0.726%,这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1,地区的需求规模是吸引服务业 FDI 的重要因素。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企业会选择在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逐渐形成产业集聚。因此,拥有高需求的国家会成为净出口国(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企业集聚后,本地市场的价格指数较低,意味着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这会吸引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工人涌入,从而降低厂商寻找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Krugman,1980、1991;Amiti,1998)。较高的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使得企业更容易发现商机、找到投资机会。因此,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会吸引较多的服务业 FDI。此外,与制造品相比,服务品的可贸易程度差(Markusen,1989),且差异化较大,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因此,服务业企业有在需求规模较大地区投资的激励。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需求规模的扩张是促使服务业 FDI 增加的重要原因。

(2)随着地区工资水平的上涨,服务业 FDI 会增加,这为本文的假设 2 提供了依据。数据显示,当工资上涨 1% 会带动服务业 FDI 上升 1.454%。随着地区工资水平的上升,吸引制造业厂商的投资的激励减弱(Lall 等,2003),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会主动将生产环节外包,在总部保留核心的研发环节和管理组织。生产性职能向控制性职能的转变促使劳动分工和城市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史忠良、沈红兵,2005),城市从生产性城市变为服务性城市。服务功能的高度集中改善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条件,为服务业 FDI 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工资上涨是 FDI 结构性转变重要的推动力量。

(3)人力资本与服务业 FDI 之间也存在正向关系,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产品模仿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都显著增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注重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储备,而不是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因此,当地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会吸引更多的服务业企业的投资。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每增加 1% 会促使服务业 FDI 增加 0.114%。但是这一关系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本文的假设 3 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

(4)人均资本存量与服务业 FDI 存在负相关关系,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会抑制服务业 FDI 的流入,这就是本文假设 4 的观点。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

不断积累,我国的资本已经慢慢丰裕起来,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从而会抑制服务业 FDI 流入。

(5)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服务业 FDI 会增加。为什么本文的计量结果与已有研究存在差异,我们认为在中国“锦标赛”式的晋升压力下,政府会主动吸引服务业 FDI,这不仅可以提高本地的资本存量,而且与制造业 FDI 相比,服务业 FDI 内含更多的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显著,更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

(6)本文支持 Raff 和 Ruhr(2001)和唐保庆(2009、2011)的观点,即服务业 FDI 会追逐下游制造业 FDI,前期制造业 FDI 每提高 1%,本期服务业 FDI 会增加约 0.06%。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关联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这也体现在 FDI 上,服务业 FDI 会追随制造业 FDI 进入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制造业 FDI 的流入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后期服务业 FDI 的进入在研发和管理上弥补前期的不足,共同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绩效。

(二)区域层面

我国幅员辽阔,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区位条件也存在很大的不同(Demurge 等,2001;林毅夫,2004)。为了研究不同地区需求规模、人力资本对服务业 FDI 区位选择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整体样本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广西 11 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8 个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贵州、云南、陕西、海南、宁夏和新疆 7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分地区的研究,计量方程与整体层面相同,但是拆分后面板数据过少,不适合在采用 GMM,我们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回归。相比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可以在小样本时提高回归的稳健性,结果见表 3。

6 个方程均通过 Chi(2)检验。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需求规模依旧是影响服务业 FDI 的重要指标,东部地区需求每增加 1% 会多吸收 0.328% 的服务业 FDI,这一数值在中部地区为 0.204%。随着东部地区的生产成本持续提高,土地价格一路上涨,中部地区拥有巨大的需求潜力,并且其基础设施良好、区位条件优越,这些无疑对服务业 FDI 具有极高吸引力。西部地区的需求也会促进服务业 FDI 的流入,但是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2)工资对于服务业 FDI 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中部的工资上升会有利于服务业 FDI 的流入。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工资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果工资进一步上升将会压缩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此时,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的利润更高,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是集中在服务业。西部地区的工资上升也会阻碍服务业 FDI 的流入,由于西部地区多是资源大省,低工资是其重要的地区比较优势。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会侵蚀这一优势,不利于服务企业的投资。

表 3 服务业 FDI 影响因素的分区域分析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方程 1 lnsfdi	方程 2 lnsfdi	方程 3 lnsfdi	方程 4 lnsfdi	方程 5 lnsfdi	方程 6 lnsfdi
lngdp		0.328* (0.199)		0.204* (0.465)		0.391 (0.247)
lnhum		0.206* (0.553)		1.333 (0.814)		-3.623*** (0.916)
lnw		1.209*** (0.468)		2.844*** (0.984)		-0.473 (1.067)
lnmfdi	0.575*** (0.0971)	0.545*** (0.131)	0.593*** (0.142)	0.426*** (0.158)	0.481*** (0.135)	0.0802 (0.120)
lnpcapital	1.305*** (0.183)	0.749** (0.307)	-0.292 (0.252)	-0.960** (0.381)	0.305 (0.430)	1.685*** (0.593)
lngov	0.00865 (0.0246)	0.0537** (0.0244)	-0.0424 (0.0363)	0.0403 (0.0382)	-0.113* (0.0630)	0.0651 (0.0592)
Constant	-8.243*** (1.825)	-17.60*** (2.834)	6.465** (2.526)	-11.58** (5.280)	1.303 (4.113)	-15.41** (7.482)
Chi(2)检验	142.65 [0.000]	212.89 [0.000]	21.38 [0.000]	45.05 [0.000]	22.15 [0.000]	80.09 [0.000]
RMSE	0.8	0.69	0.85	0.74	1.46	0.62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649	0.734	0.284	0.455	0.311	0.620
观测值	77	77	54	54	49	49
截面数	11	11	8	8	7	7

(3)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对服务业 FDI 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每提高 1%会促使服务业 FDI 增加 0.206%。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某些地区甚至已经提前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这个时候人力资本将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指标,也是吸引服务业 FDI 的关键因素。为了应对后危机时代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打下基础。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提高也会增加服务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这一关系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随着东部地区对中部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外溢效应的加强,中部地区也慢慢建立起适宜当地经济发展的工业体系,随着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提高,服务型企业的投资激励会增加。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增加不利于服务业 FDI 的流入,这是因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会主要流向东部或者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培养的人才并不能转化为当地的生产要素,而且会进一步拉大与东、中部人力资本的差距,因此不利于服务业 FDI 流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 FDI 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服务业 FDI 占比超过制造业 FDI, 本文对目前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扩展研究, 提出了一国的需求规模和人力资本共同决定 FDI 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 并利用 2004—2010 年 26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从中得到了重要的结论和启示。

第一, 在过去的十年中, 地区的需求规模对吸收服务业 FDI 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节约贸易成本、规避非关税壁垒, 服务业企业更倾向在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投资。因此, 在“十二五”期间可以通过城镇化来扩大内需, 进而吸收服务业 FDI, 利用服务业 FDI 的外溢效应来带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 工资上涨是促使 FDI 流入服务业的决定因素。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 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过去依赖加工贸易、单纯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无以为继。本文的研究为后危机时代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工资上涨虽然会降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但也会加快服务业 FDI 的流入。通过 FDI 可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提高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质量, 进而提高下游的制造业的生产率。将过去的“量多”转变为“质高”, 促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这也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的一条可行路径。

第三, 人力资本是促使服务业 FDI 流入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企业投资更多地看中当地的高级人才储备, 也间接说明服务业竞争力更多表现在产品功能、质量和性能上。为了破解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难题, 就需要加大对服务业高端人才的培养, 通过“产—学—研”的结合, 增强高校科研成果的应用性。

第四, 本文研究发现政府主动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建设会提高服务业 FDI 的流入。这说明地方政府行为并不总是损害经济发展绩效。为了发展服务业, 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开放措施, 有利于服务业 FDI 的流入。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通过发展中性政府, 明确政府职能, 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强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唐保庆. 生产者服务业 FDI 追逐制造业 FDI 吗? [J]. 财贸研究, 2009, (5): 56—63.
- [2]唐保庆, 孙少勤, 杨继军. 什么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 FDI 的区位分布——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 1985—2006 [J]. 财贸经济, 2011, (5): 92—99.
- [3]王建华, 朱昀. 我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因子分析 [J]. 国际商务, 2007, (1): 73—78.

- [4]杨仁发,刘纯彬.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FDI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107—116.
- [5]张伟,张萃.FDI 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基于 20 个行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11):82—90.
- [6]赵伟,陈文芝.FDI 的出口溢出效应:机理分析与典型产业实证[J].技术经济,2008,(3):22—27.
- [7]熊国平,李薇.我国服务业引资环境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2):90—93.
- [8]张成,赵奇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J].财经研究,2008,(12):38—52.
- [9]Alfaro L, Chanda A, Kalemli-Ozcan S, et al.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4(1): 89—112.
- [10]Alfaro L, Charlton A. Intra-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5): 2096—2119.
- [11]Antras P, Desai M A, Foley C F. Multinational firms, FDI flows, and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3): 1171—1219.
- [12]Dunning J H, McQueen M.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industr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2, 9(1): 69—90.
- [13]Kolstad I, Villanger 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24(2): 518—533.
- [14]Jones R W, Kierzkowski H.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RCER), 1988.
- [15]Lall P, Norman D W, Featherstone A M. Determinants of U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aribbean[J]. Applied Economics, 2003, 35(13): 1485—1496.
- [16]Markusen J R. Multinationals, multi-plant economies,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4, 16(3): 205—226.
- [17]Noorbakhsh F, Paloni A, Youssef A. Human capital and FDI in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9): 1593—1610.
- [18]Raff H, Von der Ruh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R]. Working Paper No. 598, 2001.
- [19]Ramasamy B, Yeung M.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J]. The World Economy, 2010, 33(4): 573—596.
- [20]Redding S, Venables A J.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2(1): 53—82.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FDI

WANG Jing-jing, CHEN Qi-fe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FDI in China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6 provinces or cities from 2004 to 2010. It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regional demand scal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and the effect of demand scale on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is the strongest in eastern China; secondly, the effects of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on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are featured by obvious heterogeneity, namely in eastern China the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in central China this relationship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n western China the increase in human capital can hinder the inflow of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thirdly, the increase in labor costs accounts for the inflow of FDI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industry,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central China; fourthly, with the rise in the stock of physical capital per capita, the demand for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will decline; government policy dividends help regions to absorb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Key words: demand scale; human capital;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FDI in manufacturing

(责任编辑 周一叶)